

《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生态翻译三维研究

史顺良, 赵 斐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阿来的边地少数民族作品《尘埃落定》向读者展现了解放前川西地区藏族人民独有的社会生活文化, 经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后在国外受许多读者的追捧与好评。生态翻译学强调“适者生存”与“天人合一”的思想, 与小说所展现的生态意识不谋而合。采用定性研究, 通过生态翻译学主张的三维转换理论研究葛浩文对《尘埃落定》的翻译, 探索英译本的成功因素。研究发现, 葛浩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选择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使译文流畅且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 也让目标语读者在其翻译中领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 促进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后其他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借鉴性。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三维转换; 《尘埃落定》; 葛浩文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3)04-0361-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10623211

A Three-Dimensional Study on Eco-Translatology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Chen Ai Luo Ding*

SHI Shunliang, ZHAO F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Chen Ai Luo Ding*”, Alai’s work about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border areas depicts the unique social life culture of Tibetan people in western Sichuan area before liberation, and it has been popular and highly reviewed among foreign readers after being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Since eco-translatology emphasize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t coincides with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embodied in the novel. This study adopt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studies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Chen Ai Luo Ding*” within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exploring the effective factors in the English version. It is found that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strategy is mainly domestication supplemented by foreignization so that the translation is easy to read and be accepted by the English readers. And his translation also reflects the exotic cultural charm, which promo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herefore, it is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Chen Ai Luo Ding*; Howard Goldblatt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作为拥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大国,“中国文化走出去”对中国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走出去”的主力军,应当肩负起文化传播的使命。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翻译学产生于21世纪初,该理论系统且全面,提出的三维转换方法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其所蕴含的生态翻译观也有利于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因此,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以阿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尘埃落定》为例,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举出实例,分析译者葛浩文做出的翻译选择,探索其译作的成功因素,为日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借鉴。

一、研究背景

藏族作家阿来所著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叙述和描写了解放前川西地区藏族人民的政治社会生活,书中情节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也向世人揭示了土司制度背后的神秘性。故事在麦其土司家“傻子”二少爷的独特第一人称视角下展开,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二少爷却总能凭借其超时代的精准预感帮助麦其土司部落一次又一次地获取胜利,而他本人也成为土司制度由盛转衰的一个见证者。《尘埃落定》于2002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证明这本书极富文学价值,可以作为中国文学的代表走向世界。

由于对中国文学的喜爱以及独特的审视眼光,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了这部作品。虽为美国人,但他曾翻译中国作家的近40部小说,是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第一人,他还凭借其翻译帮助莫言的作品《红高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经过葛浩文的翻译后,其英译本^[2]在美国乃至海外的销量都十分可观,赢得了西方文学评论界和大众读者的一致好评。因此,研究《尘埃落定》的翻译成功因素非常有意义,有望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新的借鉴和指导。

以小说名“尘埃落定”为关键词在CNKI期刊库中搜索,共显示593条搜索结果,其中大多数从罂粟的意象分析、“傻子”人物形象分析、身份认同等角度研究这部作品^[3-5],与翻译有关的研究不多,主要从象似性、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等视角

研究该小说的英译本^[6-8]。对《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发掘。

考虑到《尘埃落定》是一部带有生态主题且极具异域风情的边地少数民族小说,与生态翻译学理论视角相契合。因此,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探讨《尘埃落定》翻译成功的因素。

二、《尘埃落定》的翻译生态环境

生态翻译学用生态学的概念类比翻译学的概念,认为翻译的第一阶段是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的“天择”过程,第二阶段是译者选择对译文如何处理的“人择”过程(译者对译文的翻译选择)^[9],最终的翻译生态平衡有赖于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在《尘埃落定》中,作者以“傻子”二少爷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故事叙述,不仅向读者传达出康巴藏区的独特地理风貌与政治环境,而且在情节中也充斥着许多宗教与社会文化因素,这需要译者在适应小说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翻译选择。

翻译生态环境即外界条件,指与翻译有关的经济、语言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因素。译者只能尽力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不能逾越,在原文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下,顺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各个要素^[10]。首先,阿来在小说叙述中选择了自己的故乡——位于川西的康巴藏区作为地点。康巴藏区地理位置处于西部藏传佛教圣地拉萨与东部汉文化区域之间,这里有其独特的地理文化风貌,是一个典型的边地过渡地带。这里的藏民不仅信奉着来自印度且扎根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同时也受藏族本土宗教苯教的深刻影响。译者想要正确译出原文的内涵并不容易。这片地区与西藏的宗教至上不同,独一无二的“土司”象征这片大地的统治权,土司即最高权力中心。因此小说中贯穿着大量关于土司制度的词汇,包括“土司”“官寨”“头人”“科巴”等,这对译者来说具有挑战性,其必须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译出这些词语的内涵。

其次,川西的藏区在社会文化风俗方面也形成其独有的特点。相比于汉文化而言,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往往更加直接,方言使用简单粗暴。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的交通工具往往是马,使用的工具器皿、穿戴的服饰都带有其民族特色,食物以捕食到的猎物以及奶茶为主。这些生活习惯与汉族截然不同,读者读起来都可能带有疑问,译者

要适应这样的翻译生态环境是十分艰难的。

此外,由于《尘埃落定》的社会背景是封建制度倒塌后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时期,恰逢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也涉及到后来的抗日战争及内战。在源语文本的叙述中带有相关的政治色彩表达,例如“白色汉人”“红色汉人”等,汉语读者对这两种描述自然了然于心,但不清楚当时中国政治的目标语读者一定会产生疑问。在适应性选择的过程中,葛浩文做出客观翻译,解释清楚双方阵营的同时对相关政治问题做出规避处理,不影响小说在外传播。

需要提到的一点是,阿来的文学写作素养极高,在藏文化和汉文化中切换得游刃有余。原文中大量使用四字成语,增强故事情节交际氛围的同时也让成语的意象在读者脑海中记忆深刻。与此同时,阿来也采用了极具艺术色彩的描写手法,对比喻、拟人、双关等修辞格的运用轻车熟路,构造出许多诗情画意的景象。为了传递出交际意图,拟声词也多次在原文中出现,增强了文本的趣味性,也让读者可以轻松融入到作者营造的氛围当中。由于成语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历史沉淀,各种修辞格和拟声词又带有作者想表达的艺术美和交际美,因此翻译的任务是艰巨的,需要译者同时在三维上做出适应与选择。

三、《尘埃落定》英译本中的三维转换

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方法,要求译者在适应原文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源语文本做出三个维度上的选择,即译者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方法/技巧)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对原文进行翻译。需要说明的是,在真实的翻译环节中,三个维度往往不是单方面存在的,而是互相渗透的,只是分析的侧重点不同。以下将分别从三个维度举出具体例子进行分析说明。

(一) 语言维的转换

由于英汉语言本身存在的语言形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语言维主要从词汇、句法、语义、语言表达形式等层面对原文文本的翻译进行选择,使译文符合英语读者的语言特点和习惯^[11]。语言维就是在不同层面上译者的选择,要将原文所展现的风格体现在翻译中。这里对语言维的分析主要从词汇和句法上展开。

1. 词汇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能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词和词靠语法组合在一起称为短语,包括专有名词、成语以及歇后语等。结合《尘埃落定》原文,本节主要从藏族人名(专有名词)和四字成语展开分析。

(1) 藏族人名

《尘埃落定》的叙述主体是藏族,毫无疑问小说中会出现许多藏族人名。藏族的文化自成体系,在起名字这一点上与汉族完全不同,译者在翻译时面临巨大挑战。这里根据小说及其英译本挑选几例典型的藏族人名及译者葛浩文对人名的翻译,例如,将“桑吉卓玛”译为“Sangye Dolma”,将“索郎泽郎”译为“Sonam Tserang”以及将“翁波意西”译为“Wangpo Yeshe”等等。

大部分藏族人名都是四个字。藏族人名是经过世代藏族文化发展累积下来的,是藏族文化生命里的一部分。其中,名字音节词尾为“郎”的一般是男性,词尾为“玛”的一般是女性^[12]。从藏族人名的翻译可以得出葛浩文翻译人名使用了音译的翻译方法,属于异化策略,译文读起来与汉语拼音类似,因此葛浩文在对人名的翻译上基本与原文在语言维达到对等。然而,这样的译法也存在一些问题。问题在于他仅译出人名的读音,而没有译出藏族人名中蕴含的深刻寓意与内涵。原因在于,藏族人名起名字非常讲究,藏族人名反映出藏族文化的进程史,起名字时总带有深刻的宗教思想或表达藏族人民美好的希望,例如“卓玛”在藏语中就是“教母”的意思^[13]。采用音译法翻译忽视了藏族人名想表达出的交际意图,在语言维达到等值却没有在交际维与原文达到对等。但总体而言,音译技巧也是目前翻译藏族人名的一种主要方法,同时达到多维等值还需国内外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2) 四字成语

阿来为追求语言风格采用生动形象的表达,中间不乏四字成语的使用。成语的意思精辟,往往隐含于字面意思之中。翻译时葛浩文也是采取多种翻译方法与技巧的结合,力求与原文达到等值。例如,“刻骨铭心”被译为“fixed in people's heart”,“野心勃勃”被译为“be filled with ambition”,“形胜之地”被译为“the feng shui was perfect”。

观察以上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成语的翻译,葛浩文对四字成语翻译普遍选择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刻骨铭心”意思是“在心灵深处记忆深刻,难以

忘记”，但“刻骨”并不能直译为“carve bones”，这里采用了夸张手法，“刻骨”和“铭心”表达的意思相同，因此直接选取“铭心”的译法译为“fixed in people's heart”，这里在时态上也选择过去式，达到了语言维的等值。“野心勃勃”中“野心”即“雄心”，译为“ambition”，而“勃勃”指“充满了”野心，因此整个成语意译为“be filled with ambition”，使英语读者清楚了解词组的意思。相反，“形胜之地”出于《荀子》，不具有汉语知识储备的西方读者一定不知道这个成语在表达什么。“形胜之地”意为“地形地势优势便利的地方”，葛浩文无法正确译出“形胜”二字的意思，选择了意译基础上替换的策略，用相似的汉语词汇“风水宝地”替换译出“形胜之地”，即“the feng shui was perfect”，这里采用过去时态，较为严谨地达到语言维和交际维的对等。

2. 句法

《尘埃落定》这部作品是川西地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包含很多方言和俗语，无疑让小说变得更加真实生动，也更好地把读者带入到情节氛围中。译者需要深刻理解方言或俗语的内涵，将原文的意思准确译出。

例1 “你不想把这疯子怎么样来一下？比如就把他干了。”

译文 “Don't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madman? Such as get rid of him.”

具有一定常识的汉语读者一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对于英语读者则不然。“怎么样来一下”是指“对他做点带有惩罚性的举动”，“把他干了”的意思是“把他除掉，让他消失”。葛浩文在这句话的处理上选择意译的翻译方法，将“怎么样来一下”和“把他干了”分别译为“do something about...”和“get rid of him”，在达到语言维等值的同时，也达到了交际维的等值。

例2 总而言之，我们在那个时代定出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

译文 In any case, the rules in those days were set up to move people down, from freemen to slaves,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这句话的文化背景是土司制度统治下的阶级社会，康巴藏区有一套严格的阶级制度，原文里“骨头”指的就是阶级。按照阶级从高到低可分为土司（家族）、头人、百姓、科巴（信差）、奴隶，还

有一类人的身份没有明确划分，包括僧侣、巫师和艺人等。数量最多的是百姓阶级，但平常百姓不可能晋升身份，反而会因做错事情犯了规矩而被贬为奴隶一级，这就是原文里指的“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翻译这句话时，葛浩文采用了直译方法为主辅之以解释增译的翻译技巧，对“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做出相应解释，浅显易懂，而且这句话的译文采用过去时态，与原文相符。因此，这句话的翻译在达到语言维等值的基础上，也达到了文化维的对等。

（二）文化维的转换

文化维的选择主要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差异（宗教、政治、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全文^[14]。译者要有文化意识，努力克服由两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难，保持两种语言文化的生态平衡^[10]。在《尘埃落定》中，对于西方读者来讲其中的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是完全陌生的存在，理解会出现障碍。本节主要从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来讲葛浩文做出的翻译选择。

1. 宗教文化

前文提到在康巴藏区的藏族受藏族原始宗教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的双重影响，宗教因素贯穿其日常生活，译者在翻译时也应审慎做出选择。

例3 经堂里的喇嘛、敏珠宁寺里的喇嘛都聚在了一起。喇嘛们做了那么多面塑的动物和人像，要施法把对土司的各种诅咒和隐伏的仇恨都引到那些面塑上去。

译文 Lamas from our sutra hall and from the Mondron Ling Monastery were brought together to craft animal and human figurines from dough. In the solemn rite that followed, all the curses and latent hatred were transferred to these figurines.

这句话主要讲做法事的场景。由于苯教的影响，巫术在这片地区十分常见。苯教与藏传佛教相互融合，形成了懂巫术的喇嘛们，通过喇嘛念咒语做法事，可以去除或转移诅咒。这也体现了小说的一个特点，即魔幻与现实主义相结合。这些宗教活动给译者带来了翻译选择问题，葛浩文的译文主要以归化策略为主，没有对“做法”的解释，而是直观地向英语读者说明喇嘛们正在做什么，可以达到怎样

的效果等。因此,这句话的翻译不仅在宗教层面达到了文化维的对等,同时也达到了交际维的对等。

例4 使她能施一道斋僧茶,给死去的娃娃做个小小的道场。

译文 So she could pay for a vegetarian meal and tea for the monks to perform rites for the dead.

这句话体现出藏传佛教的思想,“斋僧茶”和“做道场”都是典型的佛教用语。“斋僧茶”指“向僧侣施以茶饭,以表报恩和追善的目的”,葛浩文这里译为“a vegetarian meal”,即以“素食饭”替代翻译“斋僧茶”。佛教中“做道场”的目的是祈福消灾或超度亡灵,在这里葛浩文将其译作“perform rites(执行仪式)”,也是在意译的基础上选择替换的翻译技巧,将佛教用语向西方读者做出解释,达到文化维与交际维的对等。

2. 政治文化

小说的叙述背景是清朝统治覆灭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后来又恰逢共产党的发展及抗日战争的发生。小说中的政治背景是相对较为复杂的,对于不了解当时中国政治的西方读者来说阅读带有一定困难。译者的翻译自然也关系到小说“走出去”的成功与否。

例5 中原王朝倾覆,雪域之地某教派也因失去扶持而衰落。

译文 A Central Plain dynasty fell, the lack of support causing the demise of a sect in the Land of the Snows.

“中原王朝”指册封土司制度的清朝,“倾覆”指清朝统治倒塌,这里葛浩文选择意译法进行翻译。后半句中“衰落”的翻译并没有用“decline”,而是采用替换技巧译为“the demise of(终止、死亡)”,这是葛浩文在适应原文翻译生态环境后做出的正确翻译选择,“demise”一词也预示着最后土司制度一定会瓦解,为后文的情节发展做铺垫。

例6 麦其土司无奈,从一个镶银嵌珠的箱子里取出清朝皇帝颁发的五品官印和一张地图,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告状去了。

译文 Left with no choice, Chieftain Maichi opened a case inlaid with silver and beads and took out a seal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official title conferred by the Qing emperor. With the seal and a map, he went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 to file a complaint with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Sichuan, under the control of

Republic of China.

清朝灭亡后,掌管四川省的是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与汪波土司的矛盾升级后,麦其土司审时度势,拿着册封官印和地图去军政府告状。在这句话中,“五品官印”葛浩文选择省译“五品”,可能是由于清朝官宦体系繁杂因而没有必要译出,在“官印”的翻译上他选择用替换技巧译为“seal(印章)”。笔者认为如此译法并没有完全与原文达到对等,虽然在功能上二者具有极大相似性,但从文化维看,葛浩文并没有译出“官印”的政治内涵。当然,从交际维来看,这一翻译选择令西方读者较容易明白原文所表达的意图。

(三) 交际维的转换

交际维的选择是指由于英汉语言在审美意识、文化观、价值观等多角度存在交际差异,译者要把重点放到交际层面上^[15]。译者不仅要把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体现出来,而且要将原文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交际意图向目标语读者体现出来^[10]。《尘埃落定》小说中存在着复杂的称呼语系统,阿来写作也用了大量的双关语来体现其语言的艺术美。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与英语文化完全不同的称呼语系统及汉语独特的双关语形式在阅读过程中也是难以理解的,以下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葛浩文在交际维上的翻译选择。

1. 称呼语

由于小说背景中客观存在的一套阶级制度,故事叙述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对相关人物的称呼语。众所周知,英汉两种语言的称呼语完全不同且各具特色。因此,对于译者来说称呼语的翻译也较为棘手,这里总结出文中几个关键称呼语,包括“主子/少爷”“奶娘”“堂兄弟/表亲”等,葛浩文分别将这些称呼语词汇译为“master(mistress)/young master”“wet nurse”和“paternal cousins/maternal”。

观察以上词语的译文,可以发现译者也是在理解具体含义的基础上综合使用翻译方法(技巧)对其进行翻译。首先,“主子”和“少爷”这类称谓词是古代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叫法,“主子”是下级对统治阶级的统称,“少爷”就是统治阶级家的儿子,葛浩文选择意译基础上的替换技巧将其分别译为“master(mistress)”和“young master”,选用英语读者所熟悉的词对原文的称谓词做出替换,

分别达到交际维与文化维的对等。其次,“奶娘”的来源是由于古代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女性不会亲自哺喂子女,因此便会雇佣乳母来哺乳。这一点西方世界也有类似的说法,所以葛浩文直接意译为“wet nurse(乳母)”,体现出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最后,堂亲和表亲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语,堂亲指亲兄弟(男性)的子女,而表亲指与姑母、舅父的子女的亲戚关系。西方社会的亲戚关系并没有明确的堂表亲之分,因此翻译时葛浩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将其分别译为“paternal”和“maternal”,这样翻译一目了然,达到交际维对等的同时也传递出中国称呼语在文化层面上的内容。

2. 双关语

阿来在创作《尘埃落定》的过程中采用极具艺术气息的手法,达到多维度的交际效果,这也是小说的艺术特色。其中,在有关罂粟花的描写中,他更是反复使用双关语,字里行间耐人寻味。双关语对翻译来说并非易事,对译者的理解能力及双语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例7 鲜艳的花朵全都凋谢了,绿叶之上,托出的是一个和尚脑袋一样青乎乎的圆球。土司笑了,说:“真像你手下小和尚们的脑袋啊。”说着,一挥佩刀,青涩的果子就碌碌地滚了一地。

活佛倒吸一口气,看着被刀斩断的地方流出了洁白的乳浆。

土司问:“听说,法力高深的喇嘛的血和凡人的不一样。难道会是这牛奶一样的颜色?”

译文 The bright flowers had withered, and the leaves now held green balls like monk's heads. The chieftain laughed, “Why, they look like the heads of your little monks.” A sweep of his dagger sent berries rolling onto the ground.

The Living Buddha sucked in his breath as he watched milky sap ooze from the decapitated stalks.

The chieftain said, “I've heard that the blood of an accomplished lam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rdinary people. Could it be this same milky color?”

例7是济嘎活佛建议麦其土司不要不仁不义地娶头人妻子央宗后,两人在罂粟地里遇见时产生的对话。虽然土司表面上像是在与活佛开玩笑,然而读者不由自主地会想到这句话其实是土司在用自己的身份和职权威逼活佛不要多管闲事,间接地告诉活佛在这片土地上土司才是最高的权力中心,不然

活佛寺庙里小和尚的脑袋便会像圆球一般的罂粟果似的被他的刀斩断。葛浩文选择了整体直译的方法,在具体的动作描写上他选择省译,类似“凡人”和“法力高深”这样涉及社会文化的词则选用了意译的方法,向读者们直观地把作者想表达的深层意思传递出来,达到了交际维的等值。

例8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大地是世界上最稳固的东西。其次,就是大地上土司国王般的权力。但当麦其土司在大片领地上初种罂粟的那一年,大地确实摇晃了。

译文 I was taught that the land is the most stable thing in the world, followed by the kingly power of the chieftain who governs it. But during the first year poppies grew on our land, the earth trembled.

例8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指当国民党最初把罂粟带上麦其土司领地时,大片地里都种植罂粟,成熟季节的罂粟就像麦田里的麦浪一样摇曳生姿,好像大地在摇晃。但是,阿来在这里一语双关,为后文的故事走向埋下伏笔,暗指土司之间会因为罂粟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展开战争,也是过量种植罂粟导致后来的粮食短缺,最后带来了梅毒等致命伤害,加快了土司制度的灭亡,官寨炸毁就像大地在摇晃。在这句话的翻译中葛浩文采取了直译法,直观地向西方读者展现原文的意思,译者虽未能译出全部隐含义,但这并不影响西方读者的接续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交际维的等值。

四、结语

本文认为用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论解释边地少数民族小说《尘埃落定》是非常合适的。从宏观角度上讲,可以确定葛浩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选择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使小说的译文流畅地道且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在其翻译中领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促进了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融合。这为日后其他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同时也为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起到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 [1] 阿来. 阿来文集: 尘埃落定[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2] ALAI. Red Poppies [M]. GOLDBLATT H, LIN S L C,

trans. Boston: Methuen, 2002.

- [3] 杨玉梅. 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J]. 民族文学研究, 1999(1): 73-77.
- [4] 寇旭华. 《尘埃落定》的象征性分析[J]. 文艺争鸣, 2009(9): 143-145.
- [5] 唐红梅. 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28(3): 167-170.
- [6] 邵璐, 高晓鹏. 《尘埃落定》英译本象似性研究[J]. 外国语文, 2019, 35(6): 101-110.
- [7] 邝冶. 从文学文体学视角论《尘埃落定》中前景化特征的翻译[D]. 重庆: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8.
- [8] 贺琼珊. 目的论视角下《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D]. 北京: 外交学院, 2018.
- [9]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0]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11] 杨自俭. 英汉对比研究管窥[J]. 外语研究, 1992(1): 13-18.
- [12] 东主才让. 藏族命名文化研究[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7(4): 104-111.
- [13] 嘎·达哇才仁. 藏族人名文化[J]. 西藏大学学报, 1996(2): 21-25.
- [14] 汤一昕.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广告语翻译[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7(S1): 143-145.
- [15] 王振平, 刘晓颖.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译者的适应和选择——以《尤利西斯》两汉译本为例[J].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3(4): 86-92.

(编辑: 朱渭波)

(上接第354页)

- [6] 叶云屏, 闫鹏飞. 通用学术英语读写课程教学探索[J]. 外语界, 2011(5): 40-47.
- [7] 蔡基刚. 中国高校学术英语存在理论依据探索[J]. 外语电化教学, 2016(1): 9-16.
- [8] 王守仁.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要点解读[J]. 外语界, 2016(3): 2-10.
- [9] 王文字, 王海啸, 陈桦. 构建具有校本特色的个性化大学英语课程体系[J]. 中国外语, 2018, 15(4): 18-26.
- [10] 杨惠中. 学术英语? 普通英语?[J]. 外语界, 2018(5): 27-33.
- [11] 文秋芳. “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 构建大学外语课堂教学理论的尝试[J]. 中国外语教育, 2014, 7(2): 3-12; 98.
- [12] 胡开宝, 谢丽欣.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未来发展方向研究[J]. 外语界, 2014(3): 12-19; 36.
- [13] 邹斌. 从中外合作大学学术英语教学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例[J]. 外语界, 2015(6): 69-76.
- [14] 邹斌, 曹博敬. 学术英语教育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6(1): 31-36.
- [15] 文秋芳. 输出驱动假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思考与建议[J]. 外语界, 2013(6): 14-22.
- [16] FLOWERDEW J, PEACOCK M. Issues in EAP: a preliminary perspective[C]//FLOWERDEW J, PEACOCK M.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24.
- [17] 冯延群, 陈淑英. 学术英语与通用英语之争——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重构[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5, 26(4): 97-101.
- [18] 高原. “尽头在远方”——通用英语向学术英语转型期外语教师的困惑来源及建议[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18, 1(1): 73-80; 93.
- [19] 蔡基刚. 以项目驱动的学术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建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2(3): 39-47.
- [20] 张文红, 王莹. 思辨能力培养与EAP教学的融合——《学术思辨英语》教材的设计理念与使用效果浅析[J]. 外语研究, 2021, 38(2): 64-69; 75.
- [21] 郑鲲鹏, 韩估颖. 学术英语自我效能感与思辨能力关系的个案研究[J]. 中国ESP研究, 2022, 26: 37-44.
- [22] 穆从军. 读后创写思辨能力培养模式及其有效性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5(2): 225-237; 319-320.
- [23] 贾光茂.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思辨英语教学[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3, 183(3): 49-57.

(编辑: 朱渭波)